

揭秘邵逸夫三重身份：娱乐教父、富豪、慈善家



邵逸夫在邵氏群星簇拥中

第一重身份：娱乐圈教父

不久前，本港传媒评选娱乐圈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六叔位居榜首。这不仅是因为他是本港“娱乐圈明星”中惟一年龄过百的人瑞，更重要的是他所执掌的TVB王国是目前亚洲最大中文节目内容的供货商，在本港有着近乎垄断的竞争态势；“邵氏出品”的影响力，甚至在港资还未全面启动北上掘金潮之前，便已先行渗入内地，TVB制作的《霍元甲》、《射雕英雄传》(胡歌版 李亚鹏版 黄日华版)等电视剧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内地引发了万人空巷的盛况，至今仍被一代人奉为“经典”；香港演艺圈的“黄金一代”也基本出自邵氏，如周润发、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刘嘉玲等等。

不仅如此，邵逸夫对推动香港电影的发展亦功不可没，他可以被视为是华人电影史的“活古董”。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他与几位兄长联袂称霸整个东南亚的电影市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越南、婆罗洲等地拥有110多家电影院和9家游乐场。1932年，邵氏兄弟在香港摄制完成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有声电影的新纪元。

由邵逸夫独掌大权的局面始于上世纪60年代。1957年，他只身赴港“创业”，一年后，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邵氏兄弟出产了1000多部影片；在日本、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00多个发行网点，专门放映邵氏公司拍摄的中国影片；当年风靡亚洲的影星，如胡蝶、阮玲玉、李丽华、林黛、凌波等无不出自邵氏门下。

可以说，邵逸夫缔造了香港影视的黄金时代。在香港的文化史上，他是一个即使再过一百年都不可被忽略的标杆性人物。

第二重身份：富豪榜常客

与时常出现在娱乐版头条的“明星”身份相比，六叔或许更钟意被视为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推得苦、做事勤勉、精通业务、市场敏锐度极强、对成本锱铢必较，老一辈港商的致富之道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邵逸夫并非出身于贫苦人家。他的父亲在上海拥有一家颇具规模的颜料公司，可邵氏兄弟无人继承父业，全数进了“娱乐圈”。他于1926年追随兄长赴新加坡开拓南洋电影市场，由职位最卑微的电影放映员做起。由于当时邵氏刚起步，

并没有自己的电影发行网络，他只能自己挑着装影片和器材的担子跑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每个角落，到有华人聚集的地方放映。

至上世纪60年代，邵逸夫的影视王国颇具规模，他的勤勉却不减年少。据说他至古稀之年仍坚持每天工作16个小时。著名导演张彻在邵手下工作过，他写的书中回忆说：“邵逸夫当年治事之勤，是我生平罕见，他坐的劳斯莱斯是名贵豪华的车，车里有酒吧，他改装成小型办公桌，连途中的时间都不浪费。”

就商人而言，六叔也算是魄力过人、决策果断。他上世纪20年代与兄长一起打拼三十余年，已在南洋积累了相当的身家，却仍选择在知天命之年赴港“创业”；至20世纪70年代末，他淡出拼搏了近50年的电影业，转向进军新兴的电视行业时，已年过古稀——即使忽略掉他所创出的那一番业绩，六叔的毅力也值得今日受困于“转型”的香港后生景仰。

拍电影、卖电影的人大多喜欢以“文化人”自居，六叔倒愿意诚实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生意人。影评家们常常指责邵氏出产的影视作品“媚俗”，缺少艺术价值，产量大、传世少。但仅以商业价值而言，专走小市民路线的“邵氏出品”称霸香港电影市场近二十年；常被斥为盛产肥皂剧的TVB，也能常年坐拥本港收视率和广告收入之首。

在营商方面，六叔则与所有对成本锱铢必较的香港老板并无差别，他甚至为此闹出了笑话。例如，当年尚未成名的李小龙曾找他毛遂自荐，欲以每部一万美元片酬拍电影。但邵逸夫认为此

人太狂妄而把价码压至每部2500美元。结果李小龙掉头投奔了六叔的竞争对手嘉禾，致使邵氏错失了香港电影史上最具有票房号召力的“金鸡”。另一次是他拒绝了一名剧务要20元买100个生煎馒头给片场工作人员的申请，理由是公司内部食堂所卖的馒头一个才一毛钱。结果，出外景的工作人员因没有早餐吃而闹罢工，邵氏为此损失了近万元。

事后，六叔的太太方逸华只好戏谑地告诉公司同仁“他可省了十元”。

第三重身份：慈善大家

六叔并非香港最有钱的人，却却是香港富豪中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可以说，他在香港的影响力源自于他的影视王国，而他在内地的口碑则主要是因为他慈善捐赠。

早在1973年，六叔就设立了邵氏基金会，从1985年起，他平均每年向内地捐赠1亿多元，用于支持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1990年，中国科学院为了表彰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据统计，二十多年来，他共向内地捐赠了34亿港元，兴建了5000多个教育和医疗项目。目前，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它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中国各地。2002年，六叔还捐资创立被誉为“东方诺贝尔”的“邵逸夫奖”，用以资助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进行研究，目前基金总额已高达50亿元。

蔡澜与方琼文：舌尖上的夫妻



《舌尖上的中国》总顾问蔡澜，他的爱吃、懂吃、有才，世人皆知。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在吃这件事上，蔡澜与太太方琼文是心有灵犀的。

方琼文曾是电影监制，工作能力极强，也很聪明，但不算太漂亮，可做出来的菜美，尤其是她能用人不要的下脚料做出美味佳肴。

好比猪肺撞，就是猪肺卦面包的那层膜，有肉，有筋，还有软骨。这东西几乎没人吃，但经方琼文精心烹饪后就变成了绝品美味，无论是拿来炒还是做捞饭，嚼起来美味一层层绽放，肉的厚实、筋的筋道、软骨的脆爽，既层次分明又杂糅融合。蔡澜尝过后惊叹：“天下至美。”还有猪颈肉，因为淋巴结多，大多数人都不能吃。方琼文用柳叶小刀细细地将淋巴剔除干净，用剩下的猪颈肉入煲。单是这一种材料，方琼文就能做出泰式酱汁烤、炭烧、花椒八角香叶焖、沙茶水煮等几十种菜式。

不过，方琼文不是主妇型太太，虽然厨艺佳，但想让她下厨，也不容易。天气好、心情好、身体好、原材料也好，她才有兴趣露上一手。更有趣的是，蔡澜越吃什么，她就越不做什么——明明念叨着石斑，端上桌的却是炒花枝；当他几乎忘了石斑时，她忽然就会端上一盘蒸得撩人肺腑的大石斑来……想吃的时候，她不一定愿意做，偶尔做了也不是最惦记的，等到不抱希望时，忽然又来了惊喜。他说，太太不像是在做菜，倒像是在调情。

在家时，蔡澜每天的行程如出一辙，尤其是每天早晨，一定是跟太太一起活动。背着那个标志性的金黄和尚袋，挽着太太准时出现在九龙城街市三层的乐园茶餐厅。

早茶一般是方琼文点，蒸笼食碟会点上七八样，因为她知道蔡澜每天早上吃得最多，而他的肠胃也习惯了这种进食方式，偶尔早茶少了一笼虾饺，到了上午11点钟他就会饿得发晕。蔡澜说，没几个人能像太太这样对他的消化系统了若指掌，什么时候吃、该吃多少、吃得不对后果如何，太太心中一清二楚。

早茶之后便是逛菜市场。夫妻俩是九龙

城的老住客，对这里的菜市场不仅熟悉，而且情有独钟。在九龙城菜市场有两个大人物——蔡澜和周润发。周润发喜欢没事在菜市场溜达，经常和菜贩合影；蔡澜则喜欢在这里买菜，给没有招牌的菜贩免费写招牌。

蔡澜一边看菜，一边跟太太看自己手书的招牌，格外有趣。比如有家原来叫“陶记鲜果”的水果店就换了一块他写的横匾“生果后官丽三千”，因为这家店的水果品种实在多，就连三角形的西瓜都有得卖，他觉得不给人家写一块与众不同的招牌简直过意不去。招牌是蔡澜写的，但名字是方琼文的创意。

做菜的时候，夫妻俩喜欢慢慢地做，两个人一起动手。蔡澜以前做菜属于快手，但总被太太诟病。她说，做菜是消磨时间的最好方法，尤其是在做一道自己很想吃的菜时，一定要慢慢享受这个过程，每个步骤都要考究，就像一篇起承转合的好文章。

蔡澜说，很多人结婚之后就期待对方的转变，同时也改变自己去适应对方，这种变化其实是不应该的。因为如果两人都改变成一个跟以前完全不同的人的话，那么你已经不是对这个人做过了承诺，那么，就可以离婚了。

蔡澜曾经很羡慕金庸有个比他小29岁的太太林乐怡，金庸似乎对此也颇为得意，无论去哪里都爱带着太太。可一次饭局之后，蔡澜再也不羡慕他了。林乐怡对金庸的饮食监管滴水不漏：海鲜不能吃，怕痛风；猪肉不能吃，担心血脂高；浓酱不能沾，会影响血黏度；豆腐不能吃，血酸浓度会增加……一顿饭下来，金庸能吃的只是一份白灼青菜，可怜巴巴的。至于餐桌上的美酒，更是与金庸无缘；饭后一支烟，想都别想。蔡澜很怕跟金庸一起吃饭，看着对方目光灼灼地盯着那些想吃而不能吃的美食，他顿生怜意，还觉得自己落筷如雨极有罪恶感。

反观自家太太，对于他吃什么喝什么抽什么，绝不干涉。蔡澜说：“抽烟伤肺、喝酒伤肝、吃肉伤胃，可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伤心！只要吃得开心，人就会快乐，身体自然会健康、会好起来。”

蔡澜跟太太平时互不干涉，偶尔想套个近乎，很容易——不必买这买那当礼物制造惊喜，他下厨做个皇帝蟹，或者太太亲手做个鲈鱼羹，然后开上一瓶好酒，一顿美味足以让两人和平共处好几天。

银婚纪念日，应一帮朋友的要求，夫妻俩举办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朋友们起哄让蔡澜说说太太的优点，蔡澜用7个字总结：“会做，爱吃，不管我。”(顾颉斐摘自11月28日《特区青年报》作者叶枫)

九龙杯失窃 周恩来设计智取



1971年3月26日中午，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一行来到上海衡山宾馆就餐。服务人员告诉总理，宾馆里丢失了国宝级的饮具九龙杯。

国宝失窃

就在前一天的3月25日下午，一个由27名罗马尼亚政府人员组成工作小组飞抵上海，为即将来华的罗马尼亚总统访问上海期间的食宿、交通等方面进行考查。

当晚，这27名外宾在上海衡山宾馆不仅吃到了美味的菜肴，还试用了神奇而珍稀的饮具九龙杯。当他们端起盛满美酒的九龙杯时，发现杯中竟有一条口含金珠的金龙在不停地转动。当杯子里没有酒时，金龙便不见了。他们反复多次，屡试不爽。

罗马尼亚外宾对这次招待晚宴非常满意。不料，一名服务人员在宴会结束后却发现，九龙杯不见了！

御用九龙杯

九龙玉杯是康熙帝甚为喜爱的酒器，它由罕见的和田产鸳鸯玉磨制而成，有一红一绿两只。每只杯上有九条龙，其中四角各有二龙戏珠，另一条位于杯把手上，也最为奇特，其昂头向上，摆尾于下，口含金珠，每有震动，上下影跳跃。而且，杯中盛满酒液便见杯中九龙腾空跃动。康熙自留红杯，绿杯则赐予孝恭仁皇后。

康熙帝驾崩后，红杯随其一起葬入清东陵景陵地宫。而另一只则在皇帝册封新皇后时下落不明。一直传到咸丰帝慈安皇后手中，后慈禧以同治帝大婚册立皇后为名，揽为己有。慈禧死后，这只九龙玉杯下落不明。

1945年9月的一天深夜，土匪田老七带领300多人持枪掘开景陵，盗抢了许多无价珍宝。匪首田老七很是干脆：“只要九龙杯。”

景陵盗案惊动了华北当局，此案破获后，许多案犯均被处死，只有田老七因交回九龙玉杯得以留命。

智取九龙杯

衡山宾馆丢失的九龙杯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提醒说：“不是拍了录像片了吗？把片子调出来看看，说不定对查清问题有帮助。”宾馆人员果然从片子中发现了九龙杯失窃的过程。原来那天晚上，罗马尼亚外交部一名34岁的文化秘书喝下几杯酒，竟趁人不备将九龙杯装进了手提包中。

周恩来指示说：“九龙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必须设法追回。”但如果此事处理不当，必然产生消极的国际影响。周恩来说：“今晚越南的同志要去观赏杂技节目，我们可以邀请罗马尼亚贵宾一起观看。九龙杯在那位外宾眼里既然十分珍贵，他一定会放在手提包里，寸步不离，我们正好借机行事，收回九龙杯。”

当晚8时整，一场精心安排的杂技、魔术演出开始了。魔术师颜金端着盘子走上舞台，盘子里摆着3只九龙杯。颜金掏出一把手枪对观众说道：“只要枪声一响，我想让九龙杯飞到哪里就可以飞到哪里。”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枪响，3只九龙杯少了一只。正当观众感到惊诧时，颜金径直走到那位罗马尼亚外宾面前说道：“被我一枪打飞的那只九龙杯就在这位先生的手提包里。请您打开包，看看我说得对不对。”此时，原本也很惊诧的这位罗马尼亚外宾似乎明白了，遂假装疑惑而又无奈地打开手提包，拿出了那只被他盗走20多个小时的九龙杯。

此杯非彼杯

这只九龙杯是不是盗匪从景陵中盗出的那件呢？

当年，侦破景陵大案后，江西景德镇一位著名陶瓷专家对九龙杯的制作工艺极为惊异，经过多年研究，他终于在1958年成功烧制出与宋代汝窑所出御瓷极为相近，又与康熙皇帝的九龙玉杯神形兼备的陶瓷精品。消息传开后，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立即派人赶往景德镇，向这位陶瓷专家定制了一套36只九龙杯。

令人遗憾的是，陶瓷九龙杯交货后不久，那位陶瓷专家就不幸离世。尔后，没有人能破译此项制作技艺，遗留下来的这套九龙杯便成为世间绝品。至于从匪徒手里取回的康熙御用九龙玉杯的下落，据当年侦破此案的云光回忆：“自九龙玉杯上交政府后，我多次到故宫寻找，可是一直未见其踪影，也不知那宝物今在何处。”

(《党史纵横》2013年第11期 常家树)

天南地北

第226期



北京大学逸夫楼

主编 鲁绿

Email: wlx765@163.com